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五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二二期 ——  
（二〇〇八年一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1c）

---

【专题研究】太阳最红的年代 （讲演录，下篇二） 辛灏年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专题研究】

太阳最红的年代 （讲演录，下篇二）  
——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与过程（下）

• 辛灏年 •

第九、以支持、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以诱发青年学生“拥毛造反”

一、毛泽东和“十六条”吹捧“保护”青年学生

中国自古就有两句格言，一句是“少不更事”，一句就是“自古英雄出少年”。所谓少不更事，就是说年纪太轻，懂的事情太少，容易出岔子、犯错误，甚至容易被人诱骗做坏事，直至走上邪路。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却说的是，正是因为年少，“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胆子大，敢于闯，不会瞻前顾后，当然，闯对了路，也会成为英雄，甚至会成就一番事业。这两句话都对，并且不矛盾。因为，历史上已经有无数的例子，分别证明了这两句格言的正确。

而毛泽东所看重的，就既是青年学生“少不更事”；又是“少年英雄”那番敢冲敢打敢拼命的“革命精神”。诚如我在前面早已详细说过的那样，毛泽东和共产党早就拥有了利用年轻学生的丰富历史经验，而且次次灵验，“功勋卓著”，所以，当他终于要发动一场革命造反来打倒刘少奇、清洗刘家党、旨在夺回自己已经丧失的党内实权之时，他竟然又一次利用了青年学生们“少不更事”的年龄特征，和“自古英雄出少年”的青少年奋斗欲望，利用自己早已被、和正在被神化的无上领袖地位，将他们诱骗上了一条“灭人性、绝人伦”的所谓革命造反之路。让

他们去当先锋，去做闯将，去“敢把皇帝拉下马”，最后则将他们推向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境地。

为了将这样一场“以下攻上、以外攻内、以小攻老、男女老少皆能互攻恶斗”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地发动起来，以达到毛泽东要打倒“马列中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党羽的目的，在运动的发动期，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后，尤其是之后，毛泽东对于被他后来敕封的革命小将即“红卫兵”，以及青年学生们，一是根据中共的历史经验，早已谋定“故伎重演”——决心再一次利用年轻学生的“少不更事”，以助其革刘少奇的命；二是“眼疾手厉”——就是在他发现年轻学生的动向确实是殊可利用之时，便立即地加以拉拢利用，甚至连怕马屁的手段也都尽情地使用了出来；三是“极力保护”——就是在他要发动的这一场革命造反，还必须要利用这些“革命小将”来充当“革命闯将”，“来冲、来打、甚至是来杀”之时，他则使出浑身解数来保护他的革命小将们，唯恐他们被刘家党用种种办法将小将们的造反革命消化于无形。

就“故伎重演”来说，早在1966年7月21日，刚刚从武汉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就在他“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中，明确地告诉大家说：“5月25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他开诚布公地说明了造反和造反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把聂元梓的大字报比成了世界共成革命历史上的“巴黎公社宣言”。

紧接着，毛就话锋头一转，居然讲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他说：“……有几个少先队员给他们的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记了过去，没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只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我叫陈伯达同志告诉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好。”毛在这里，不但发现了少年的“无知可用”，而且发现了自己的“神威所及”，他决心要利用了。

于是，他干脆将话清楚明白地说出了口。他说：“我要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说到了正题，毛又惺惺作态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说到此处，毛又将脸陡然一变，厉声地说：“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然后，他终于对各位中央首长恐吓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就是1966年7月22日，毛又“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中迫不及待地：“……要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他要以革命师生来取代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了。

到了1966年7月24日、25日，毛泽东又在连续地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这个时候，他是反过来把年轻学生当成了他要发动文化革命的“救星”的。

……

这就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年轻学生的“故伎重演”，就象刘少奇在一九三五年底曾经利用北京年轻学生的爱国热情，发动了那一场“假抗日、真救共”的著名一·二九学生运动一样；更象在1945—1949年共产党在“为篡立马列中国、而要颠覆中华中国”所发动的内战中，

毛曾在“毛管区”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共在“蒋管区”所发动的学生运动就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只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却是要利用年轻学生帮助他发动内讧来打倒共产党的另一个领袖——刘少奇罢了！

就“眼疾手利”来说，就是向来善于抓“新生事物”的毛泽东，因唯恐文革不能按照他的意愿发动起来，因此，当他突然之间发现了“红卫兵”这三个字时，他在情绪上的兴奋和他在行动上的迅速，同样都是十分“伟大”的。我在前面已经提到，1966年12月9日晚10时，周恩来曾在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内对革命小将发表了“谈红卫兵对外影响的问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说：“……红卫兵6月诞生后，7月发展，仍是少数，但被主席发现了，抓住了，鉴于主席对清华附中的支持，在陈伯达同志的报告中谈过。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上天安门，震动世界，成了一股青少年突击力量……在工作组撤销后，象北大、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等，阻力小了，冲向了社会，他们取得了成绩……现在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红卫兵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这说明红卫兵对世界的影响……”

周恩来对革命小将们拍马屁的话，“言之不虚”。

因为，用王友琴的研究成果来说，就是：……“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在1966年6月1日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出现于中学校园。1966年6月2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用“红卫兵”名义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稍后作的“造反歌”词，则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可以说，这个“新生事物”在诞生伊始时，所立即标明的政治立场和行动方向，对毛泽东来说，非但是“正合孤意”，而且是“求之不得”。这不仅与他要发动这一场造反革命大有好处，而且这一场文革所需要的，就正是这样一批“革命闯将”。有了他们，才好为他冲开局面。因此，毛泽东一经发现，就立即抓住不放，热情支持。因为，诚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七月份，这些红卫兵“仍是少数”。毛决心要他的红卫兵大大地发展起来。

所以，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便极其热忱地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的；无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民，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毛对红卫兵的这个马屁，可以说是拍得够响亮的了。而它所产生的作用，也就更加难以想像。

由于毛泽东无意之中，发现了自己的一支“近卫军和冲锋队”，而这支近卫军和冲锋队此刻已开始大打出手，横行京城。所以，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干脆就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面说：“……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毛泽东说这些话时，胆气显然是更壮、目标也是更明确了。

所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十六条”才会明确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少不更事的年轻学生，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公开颁布的文献中，竟然是“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于是，在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竟然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所谓革命学生代表——就是那些敢于在学校跟工作组抗衡和斗争的“根正苗红的革命闯将”们。

于是，毛泽东决心用接见红卫兵的方式，将正在“造反打人、革命杀人”的红卫兵运动铺天盖地地扩展开来。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首都和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他的副统帅林彪在大会上声嘶竭力地对青年学生、革命小将和红卫兵们号召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一场如同并超过了希特勒纳粹运动的中共红卫兵运动，一支酷似希特勒冲锋队和党卫军、只是更加残酷的中共党卫军和红卫兵队伍，就这样开始横心无忌地在中国的大地上，发起了种种史无前例的暴行。

就“竭力保护”来说，第一，在中共的文献“十六条”中，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十六条”之所以这样明确地把不整学生的话说得这样死，并不是毛泽东和共党当真对年轻学生“别有一番柔情在心头”，而是毛泽东早已认定了，发动文革所要依靠的革命闯将，就是这支“年轻的文化大革命大军！”如果现在就允许整杀这支“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大军”，共产党的文革就发动不起来了。这个死理，是被毛泽东认准了，也认死了。至于他在利用完了他的革命小将之后，又是怎样“杀狡兔、烹走狗”的，那是后话。

还有，就是由于“十六条”正式地将“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布告了天下，所以，一大批原来出身“红五类”、特别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中共红贵族子弟，就是那些正在喊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早期红卫兵们，最典型的就是刘少奇及其他一些“大走资派”的子女们，将要迅速地成为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走资派”家属，甚至成为新的“黑七类、黑八类”子女。因此，如果一旦由着学生斗起学生来，或挑动起学生斗学生来，则共产党子女内部的火热斗争，也同样有可能转移毛的文革大方向。这当然对他刚刚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极为不利。

再就是，尽管毛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对“不准学生斗学生”下了死规定，但是，在“十六条”颁布之后，特别是在八、九两个月，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红卫兵批斗、拷打甚至是公然杀死原出身“黑五类”年轻学生的事情，非但没有及时收敛，而且极其猖狂。北京的中学生遇罗克，仅仅是写文章批评了对“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歧视，他就不仅在1968年被逮捕，还在1970年“打击反革命”的运动中被判处死刑枪决。对此，我在后面将要详细说到。

第二，刘少奇及其党羽，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就象彭真搞出“二月提纲”和刘少奇大派工作组，都是为了抵制毛一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家党确乎已经处于明显的逆势，刘少奇本人也失去了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文化革命的一线大权。但是，一是刘少奇在党内确是“根深蒂固”，二是刘少奇党羽甚众，三是全国各地的刘家党仍然处于重要的权力地位之上，他

们还有的是力量来对这场矛头已经明确指向了“自己”的政治运动，进行顽强的抵抗，虽然在已经被神化了的伟大领袖脚下，他们不敢作公开的反，甚至还要接过“拥毛造反”的旗号，以“暗渡陈仓”，也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正因为如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开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之后，全国各地的刘家党为了“保刘”、更为了“自保”，面对着红卫兵的迅速崛起，特别是针对着红卫兵们冲着他们而来的狂妄造反行为，他们曾想过种种办法，来抵制红卫兵和青年学生的造反大潮。而在八、九这两个月，他们想出来的最高明的办法，一个就是动员不知深浅的工人、特别是农民，来保护他们，借以抵抗红卫兵和革命小将对他们的造反和革命，从而在全国各地都制造出了工人、特别是农民与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冲突，原因就是红卫兵要斗当地的“走资派”，工人和农民则要保护毛主席的“好干部”，有的工人和农民甚至干脆从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手中，将走资派和好干部抢而去之。北京郊区的农民就曾把人民大学一个叫郭影秋走资派抢到乡下保护起来了……。另一个则是借口毛主席曾号召知识青年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而趁机安排红卫兵和年轻学生下农村帮农民夏收和秋收，以便将这些令他们头疼的革命小将推向农村的广阔天地，让他们有劲都使到庄稼地里去。反正刘少奇早已决定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我们安徽的“走资派”们，当时就把我们这些中学生下放到了乡下，要不是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学校那些消息灵通的红卫兵得到消息，说是让我们下乡是为了不给我们造反革命，我们还都被蒙在鼓里。两年后，当毛泽东也用这个办法把全国的年轻学生——无论是有没有为他卖过命、造过反、当过炮灰的，都统统强行送到“广阔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不知道他是否也是从“走资派”那里学来的这一招了。

针对“十六条”颁布之后出现的这种新情况，用文革的语言来说，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毛泽东立即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他党内的政敌们在跟他捣乱，完全是他们组织起来的，是在破坏他的“伟大战略部署”。

1966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1966年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对青岛、长沙、西安问题的指示”中，这样写道：

林彪、周恩来、陶铸、伯达、任重、江青：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的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不行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兵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在北京）除人大调六百名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没有，以北京经验告诉外地……

196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专门对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作出了“四项决定”，称：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的紧张形势的症结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做法是十错误的……

“为此，中央决定：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对学生。二、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三、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涉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

的言论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同学生直接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四、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同他们商量问题……”

毛泽东对保护他的革命学生、革命小将、红卫兵们，不仅尽心尽意，而且言辞迫切。因为他知道，工人、农民反对年轻学生的背景，是“走资派”们组织的，是他们“保刘”和“自保”的一种举动。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一再地称呼工农兵是他和共产党的“广大革命群众”，但在文革的发动期，他还是宁要他的青年学生、革命小将，而可以暂且不要他的那些所谓“广大工农兵群众”的……。

毛当然为的是自己。

### 三、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和发动全国学生大串联

第一、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全国学生大串联，是毛泽东在及时抓住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之后，所使用的一个“迅速扩展红卫兵运动以发展文革造反形势”的重要手段。

我刚刚已经讲到，1966年12月9日晚10时，周恩来在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发表关于“红卫兵对外影响问题”的谈话时，就明确地说过：“……红卫兵6月诞生后，7月发展，仍是少数，但被主席发现了，抓住了……。”

其实，早在1966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说过：“……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试图利用青年学生制造“天下大乱”的最早表示。

这之后，就是8月1日他那封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了。这封信对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所起到的煽情作用，当然可以想像。

8月4日，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就已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地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汪东兴所说的，大概是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最早开始的串连活动，大概也是使毛泽东萌生采取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大串连的方式，来发动文革造反、冲开文革局面的触发点，因为这与毛在六月初的讲话一拍即合。

果不其然，不过12天之后，就是8月16日，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发表讲话时，就已经说道：“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讲话，自然是对“大串连”的一个号召和动员，自然是因为毛已经作出了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的决定。因为，仅仅是两天之后，毛泽东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了。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号召，它不仅迅疾地推动起了红卫兵和青年学生的“革命大串连”运动，而且表明，毛泽东决心要亲自走上第一线，以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早已被神化的形象，直接地和面对面地发动文革造反了。也就是说，这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之“神”，是要在他对人民的直接指挥之下，使他要发动文革造反的意志，变为全民的意志和行动。因为，八月初，当毛突然出现在首都“文化大革命接待站”接见群众，号召他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在场革命群众那种“激动万分”的情景，使他对自己已经被“神化”的伟大领袖形象，有了直接和更加深刻的了解。这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他对自己的信念，和他一定能够打倒刘少奇的信心。

为了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该《通知》无微不至地规定了：“……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正是这样一份史无前例的《通知》，将全中国千千万万人的青年学生鼓动起来参加了串连，涌到了北京。目的，当然是为了制造“刘的天下大乱”，以达到“毛的天下独治”。

然而，毛仍然是在“顺天应人”，就是说，他的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不过是顺从“民心”而已。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称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这样说道：“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也就是说，不是毛要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要见他；不是毛要发动大串连，而是青年学生要串连，毛认为应该大大地支持他们。因为，毛所做的，就是人民要做的；毛要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说这个文化大革命，还史无前例地要打倒一大批“共产党自己的走资派”呢！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和发动青年学生大串连，确实将文化大革命的这把火，这一股毒焰，在全中国烧得无比兴旺而又极其惨烈。

红卫兵大串连的队伍，就像是一股巨大的红色山洪，突然的爆发了开来，并且立即横流在中国的大地上。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大寨、瑞金、遵义等“共产革命圣地”，一次又一次地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们。

“马列中国”的首都北京居然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接待站，成百上千万各地来的青年学生、革命小将，发了疯似地一次又一次地聚集在象征着“天子脚下”的天安门广场上，等待着“天子”的接见，等待着狂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神圣”时刻。而当那一尊“神”终于出现的时候，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则个个热泪盈眶，声嘶力竭，广场上血色的旗海，就像是一波波在纵情翻滚的“血浪”……

在红太阳当年造反革命发迹的江西省井冈山，“……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学校，有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接待红卫兵。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设有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下辖17个接待站，……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派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胡平、张胜友：《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

绝大多数“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确实被他们的伟大领袖激发出了无限的革命激情。就在一部分青年学生涌上火车、轮船、汽车，奔向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串连革命、交流造反”的时候，还有一部份更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开始了“徒步串连”。因为，他们要学习当年“红军”大无畏的“逃跑精神”，也要在中国的山山水水之间，留下他们今日的“革命足迹”。为此，《人

民日报》立即发出社论，题目就是《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写道：“……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就这样，一支支“长征队”组成了。有的红卫兵长征队居然要按照当年红军长征——就是“逃跑”的路线再走一遍，以表示他们要继承共产党光荣革命传统的气魄和决心。

还有的红卫兵居然根据马克思和列宁要搞世界共产革命的遗教，要搞世界文化大革命大串连，要把马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燃遍全球。1966年9月，一辆国际列车在海拉尔被几十名红卫兵小将卧轨拦截，红卫兵一拥而上，挤进车厢，向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乘客散发“红宝书”和各种红卫兵战报……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连问题的通知”中宣称：“自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天安门接见北京和外地来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以来，全国掀起了革命大串连的高潮。预计到十一月二十日止，来过首都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将近九百万人。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时间里，举行了七次盛大的接见大会……”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中宣告：“……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了二百五十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心要发动的革命造反，看样子是真地给他疯狂地煽动起来了。

第二、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是毛泽东加速推行对他“个人崇拜”的重要战略，从而使对毛的“造神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升级。这无疑将极其有利于他号召打倒刘少奇，清除刘家党。因为，毛越被神化，刘就越不是他的对手。

首先，如前面所讲，红卫兵虽为“自发”，但他本身就是中共十七年的“共产革命教育”、特别是六十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和林彪发起“造神运动”的产物。

其次，由红卫兵所发起的新一波造神运动，不仅正是毛泽东所需要，而且正是毛泽东亲自对它的推波助浪，才使它得以“横空出世”，然后才“横行中国”的。就不说那个正在领导着文革的阴谋领袖集团了——红卫兵的一切崇毛行为和一切的造神行动，都得到了他们的极大支持、甚至是背后教唆。因为这一伙阴谋家深知，唯有将毛神化到人人崇拜、个个畏惧的地步，这一场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他们才会有胜利的保证。

再就是，虽然“……红卫兵的名称说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兵并要保卫他。这里不讨论当时毛泽东是否需要被保卫，而是要指出红卫兵确实掀起了文革中对毛泽东群众性崇拜的第一波。他们也开始了普遍实践一套新的社会礼仪（最初由当年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所发明——讲演者注）：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本，跳赞颂毛的舞蹈，到处张挂毛的画像及语录，每一次讲话都以毛的一段语录开头，并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结束。（王友琴：1966——打老师的革命）”红卫兵的这套对毛泽东进行极端个人崇拜的行为，就是极端神化毛泽东的方式，立即迅速地波及全国，使得全体中国人，无论大小男女老少，无人敢于违背，就更不用说“反对”了。这自然是一波新的造神运动，而且史无前例。今天回想起来，凡是过来人，除掉极少数对毛泽东仍然怀着深恐恋情的前造反派头头以外，可以说，没有人闻之不感到



恶心。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全国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就把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连小胡同里的建筑物也不肯放过。在商店、住房等处，红卫兵号召革命群众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上墙壁，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在农村，则竖起一块块红色牌坊，书写毛主席语录。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工厂、商店、街道、学校，则一律都非得用红颜色书写不可。文革时期的红海洋就是这样来的。正是这一波造神运动，不仅造成了对毛泽东进行“早请示晚汇报”这样一种“宗教仪式”的出现，而且造成了在全国城乡都出现了一尊又一尊的毛泽东的巨幅塑像，甚至连“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拦在路口，要过路者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镜头”，也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里出现了（上述内容选自“红卫兵档案”——讲演者注）……这当然是十七年间共产党年年、月月、日日对青少年进行所谓“革命传统教育”的结果。

然而，一幕幕人间悲剧却因此而遍布国中：一位教师因为写标语发生了笔误，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个农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就被绑押游街，妻子因此而投井自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为把毛泽东画像上的灰尘掸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却被说成“企图掐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份子，而被判刑劳改；更有类似者竟因此被判处死刑。因为红卫兵喊的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上述内容引自“红卫兵档案”——讲演者注）而这一切都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为开端。由此可知，红卫兵运动，绝不单纯的是一场民间的崇拜运动和造神运动，恰恰相反，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间”自发产生，却由中共政权大力发动扩张，并由共产党的铁血专政机关所密切配合。犹如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其万岁声愈是山呼海啸，则北京城内的鬼哭狼嚎，就愈加令人惊心动魄。因为，正是毛的接见，才一次又一次地壮了红卫兵们敢于“公然打、砸、抢、抄、烧、杀”的通天胆量。

正是在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中，毛泽东又一次被大大地神化了起来。他被红卫兵们捧成了他们的“红司令”。因而，1966年8月31日，当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林彪和周恩来，也就是当时的第二、第三号人物，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就不说，林彪直到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前（——姑且依照共产党对林彪事件的说法——讲演者注），他那跟在毛的身后举着小红书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中国人不屑的记忆之中；还有，就是周恩来胸前的那一枚毛泽东像章，竟一直戴到他痛苦地和深感罪孽地离开这个他曾参预制造的魍魉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所发动的造神运动中，毛泽东的最高封号——“四个伟大”出现了。1966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秘书处“关于做好外地来京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离京工作的一封信”，就是用“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来开头的。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所发动的造神运动中，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便常常是这样一些今天读来令人倍感肉麻的言辞：“……时间啊，请你收住脚步；汽车啊，请你开得慢些。翻身农奴的后代，西藏高原的红卫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引自《红卫兵档案》）

于是，红卫兵们登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博物馆中厅的毛泽东雕像前，齐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胡平、张胜友：《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

于是，红卫兵们从天南海北长途跋涉来到十万大山之中，竟然就是要领略一下伟大领袖毛

主席那两句“苍山似海，残阳如血”的豪迈诗句（同上）。

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秘书处“关于做好外地来京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离京工作的一封信”，才会深情无限地总结说，毛的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也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毛泽东用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这两个手段，终于成功地激发了青年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特别是激发了一代“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对毛的疯狂崇拜，从而不仅使广大青年学生成了毛所寄望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而且使对毛泽东的“神化”上升到了一个疯狂的高度。诚如我在前面所说，在这一尊被造就的“神象”面前，刘少奇和他的党羽的失败，似乎真地已经被注定了。

第三、毛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全国学生大串联本身，虽有“皇恩浩荡”的意义，却并非是“白吃的午餐”。因为，正是在接见和号召之间，毛和他的阴谋小组织，早已将文革造反的“根本目标和具体任务”，耳提面命地交给了年轻的“革命闯将”们。

正因为如此，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才被大大地冲开了局面，刘少奇的重要党羽们才第一次遭遇了可怕的冲击，从而为下一波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直接批判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及邓小平，更为毛泽东夺权的成功，造就了队伍，打出了声势。

早在1966年9月5日，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刚刚进入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各地革命师生前来北京参观学习的通知”中，已经宣称：“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各地许多学校的革命时师生前来北京参观、学习、进行革命串连，交流革命经验，并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接见，这对于鼓舞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推动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热情支持广大革命师生的这种革命行动……”

1966年10月16日，在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的高潮中，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可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

1966年11月12日，当毛泽东和他的阴谋小组织已经在策划上海的造反夺权风暴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秘书处又发出了“关于做好外地来京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离京工作的一封信”，明确地指出：“……各地在京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们，希望你们带着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带着革命串连经验，尽快的返回本地区，按照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2月3日，就在毛泽东要乘上海“一月革命”造反夺权成功的势头，迫不及待要在全中国发动夺权斗争，却又遭遇刘家党、甚至非刘家党的顽强抵抗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称：“……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份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该回到本地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抉择。”

正是在毛泽东号召，中央文革小组竭力发动、支持、策划和及时“交付秘密使命”的革命大串连中，虽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在来到“马列中国”的疯狂首都北京之后，除掉

焦急地等候着毛泽东的接见、激情地被毛泽东接见以外，就是到清华、北大和首都的各大中学校去学习革命经验，摘抄大字报，打听和纪录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时刻准备着回去造反革命，但更重要的却是，北京的红卫兵则纷纷南下，西去或北上，去散布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去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因为这些来自“天子脚下”的红卫兵和革命小将们，是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又得“天时地利”之便，因而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再加上其中已经“通了天”的，又一再地为中央文革小组“耳提面命”，所以，他们奔向全国各地的大串连，自然就别有一番不同的“革命意义”。

所以，他们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贴大字报，搭辩论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谁？当然是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们颐指气使的作派，“天生革命家”的派头和“钦差大臣”的姿态，不仅将当地的红卫兵们镇住了，而且更将本地的走资派们吓住了。反过来，一省一地的党政最高领导们，就是那些至少在眼下还没有人敢于批判、斗争的“走资派”们，他们简直不敢想像，那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居然敢将他们从床上直接拖到批斗大会的讲台上……为此，北京来的红卫兵们尽管遭到了本地人的反对，甚至遭遇当地红卫兵小将的围攻、谩骂甚至关押，比如他们在上海，就遭遇了当地红卫兵的昼夜围攻；在贵阳，更遭遇了当地数万“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层层包围……；但他们毫不在乎。因为，非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心中有底，而且局势发展很快，共产党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一次又一次支持红卫兵造反革命的讲话，都给北京来的红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因此，他们立即反过来号召当地革命群众，对操纵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当地党政领导展开勇猛的反攻。于是，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和当地另一部分红卫兵便迅速地联合了起来，立即形成了极其浩大的声势，当地的走资派们开始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1966年11月4日，四川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未想，北京来四川点火的红卫兵驾到，立即造了省委的反，三级干部会议只好停开。到了12月底，北京红卫兵又进驻了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负责人立即被拉上街头轮番批斗，四川“造走资派反”的局面终于被他们首先打开……

1966年12月初，北京聂元梓、蒯大富受中央文革之命，到南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一到南京，就立即号召当地红卫兵要“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省党委。”就这样，南京市及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便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以上资料选自《红卫兵档案》）

从北京来到江西井冈山来的红卫兵们，一走进井冈山博物馆，就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老右”等字句；然后他们在第三展厅那一幅“朱毛会师”的巨型油画上，将一个通红的大叉叉打在朱德的大腿上；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冈山斗争”部分，他们还张贴了“这是为大阴谋家、野心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标语……众所周知的是，在那场毛泽东要清洗自己党人的文化大革命中，朱德虽得到保全，在抑郁中寿终正寝，但贺龙却被批斗直至饿死，彭德怀则被老账新账一起算，直到被红卫兵们斗死为止……

北京来的某些红卫兵显然是有“来头”的。因为北京有很多红卫兵到各地串连，不是事先接受了中央文革交付的使命，就是受到了某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人物的暗示，林彪、四人帮两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所陆续披露的大量材料早已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大串连中，揪彭德怀，就是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的电话。戚本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海瑞就是彭德怀。于是，1966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成都市永兴巷7号彭德怀住宅便被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围了。红卫兵们翻墙而入，面对彭德怀宣布中央文革指示，然后就把彭德怀押上了火车。

12月28日，火车抵达北京，红卫兵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碰头会”的戚本禹立即站起来，眉飞色舞地向与会者通报：“当代‘海瑞’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回北京！”（以上资料选自胡平、张胜友：《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

有两点，似乎还应该有所说明。一个就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共产党在文革中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就不仅仅是号召和发生在毛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伊始，而且，正是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才及时地和极其疯狂地将那一场“绝中华人伦、灭中华文化”的万恶不赦的运动，迅疾地推向了全中国，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万古一难。另一个，就是毛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是发生在中共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个高潮之间。就是发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颁布十六条之后，和结束在中共文革夺权开始之前。对前者来说，正是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才将中共发动的文化革命，推向了发动期的高潮，就是真正打开了毛泽东所需要的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对后者来说，则是为下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张本和铺垫，为即将和已经到来的中共内部残酷的夺权斗争，既训练了先锋和打手，又制造了“祸水”……。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就“在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得意地说道：“我还没有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了这么大的事……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联，谁也没料到，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你（指李先念）也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自得地说，“……给清华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我写的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还没有发出号召，全国红卫兵都闹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

确实，毛泽东就凭着策划一张大字报、组建一支红卫兵和发动一番大串连，就不仅毒杀了无数的无辜百姓和知识分子，而且确实搞乱了共产党内的现存秩序，使他在党内的政敌们一时之间当真变得“无所措手脚”了。

对毛泽东而言，则是“天下已经大乱，夺权就要开始”。

## 第十、以公开号召、蓄意教唆和默许残杀来煽动红卫兵带头造反

### 一、马列革命理论和中共革命实践的恶劣影响

近些年来，我曾各地的讲演中，一再地讲过，要“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是一个完全按照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罪恶的“理论链条”，来夺权篡国和实行残暴的专制复辟统治的。我因在《谁是新中国》一书和上述的讲演中，对此都有详尽的说明，在这里我就不再详加叙说。

我现在想说的是，正是因为中共赖以篡国、治国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罪恶的“链条理论”，所以，他不仅为了篡国，而实践这个理论；而且为了治国，他也同样要厉行这个理论。如此，用中共的话来说，“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也就是孔子《大学》里面所说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意思。用一句极平易的话来说，对于普通人、大多数人、特别是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总是“有样学样”的。

更何况，中共实行的，又是酷似中世纪欧洲的残酷“教政合一”统治，再加上这个“统治”

既经过“苏化”，又为中共所“照样全搬”，就是“独尊马列、杀尽百家”。所以，它不仅在统治的现实中，一再制造阶级斗争，残酷实行共产党专政，自始至终地迷信暴力镇压，而且一再地和持续地对年轻一代进行他那个“残暴的革命传统”教育。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长期以来，他们不仅亲眼看到了什么是残酷的暴力专政，更可怕的是领会了残酷的“暴力专政”和革命的“理所当然”关系。再加上实行“全方位专制统治”的中共，又用一切手段，包括电影、文学、戏剧，甚至一切民间的文艺形式，来强化他对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宣扬。于是，马列的这个罪恶的“链条理论”，就不仅毒化了一代青年的幼稚心灵，而且成了他们赖以行动的思想指南，甚至是“感情基础”。

特别是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个人崇拜行为，开始发酵成为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之时，六十年代上半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场进一步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又成了举国上下一场疯狂的“读宝书”运动。而毛泽东著作又确实是马列罪恶理论的“中共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和最高阶段”，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著作里面的那些易懂、易学、十分容易“活学活用”的东西，诸如“把反动派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对阶级敌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等等，等等，就在毛泽东另一个伟大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号召鼓动之下，全部变成了那一代青年的“革命行动指南和革命行动榜样”了。

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那个拍马屁的共产党“大音乐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所创作的“毛主席语录歌”，就几乎是自始至终地伴随着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种种“残暴革命行动”，将那个“不可能可爱的马列中国”，岂但是“搅得周天寒彻”，而且是“革得满地冤狱”。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理论的、文艺的等等各种原因，所造就的暴力时代气氛之下，那个史无前例的暴君一旦还要根据马列那个万恶的“链条理论”，和自身革命造反的残暴“经验和榜样”，来号召发动一场更新的和更大规模的革命造反，即“整人杀人”运动时，似乎一切都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而他所需要的，就仅仅是“手段”而已。而手段，他却“有的是”。

## 二、中共十六条是红卫兵造反派敢于“斗打抄砸烧杀”的张本

当年的走资派在重新掌权之后，曾对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红卫兵造反派找到了几项大的罪名，其中有一项，就是称他们是“打砸抢抄”份子，并且将他们作为一项“帽子”，按在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们的头上，至今也不想给他们摘掉，就更不用说平反了。他们当中还有人因此被指认“触犯了共产党的刑法”，而被判刑劳改，其中有人在出狱后便成了“民运人士”，开始参加甚至领导“民主运动”。所以，他们当中一些曾真心跟着毛泽东造过反，并且自认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的造反派头头，为此一直感到很痛苦。大概这也是他们有些人跑到海外后，一心要想出“种种说法”，以为自己“彻底平反”的又一个原因。对此，当然值得同情。

但是，我认为，不仅对所有红卫兵和造反派都加上这样一项“帽子”不对，而且也不符合文革发动期的事实。因为，在文革的发动期，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六一横扫社论”发表后，到十月初中共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夺权”还没有正式开始和大规模开始之前，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或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还没有“抢”，一些社会上的流氓地痞还没有来得及成为“造反派战士”，也还不敢自称是“造反派战友”，所谓“造反派的脾气”也还没有成熟成形。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共产党的“革命”这两个字，还

真是闪烁着血红的“理想主义”的寒光，使他们不大敢造次，虽然这个理想既虚假，又残酷。

但是，在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时期内，虽不能称红卫兵和造反派为“打砸抢抄”份子，但却可以称他们为“斗、打、抄、砸、烧、杀”之徒。因为，在那段时间内，他们不仅敢于斗，而且已经敢于打，甚至敢于公开地杀人了。至于抄和砸，那是家常便饭，完全不在话下。而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就是因为中共颁布的十六条，成了他们敢于“斗、打、抄、砸、烧、杀”的革命动力。虽然，对那个“斗”字，共产党要回避，因为是共产党号召“斗”的，要是没有共产党号召“斗”，就不会出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打砸抄”。而对那一个“烧”字，就是指中共在号召“破四旧、立四新”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疯狂焚烧中华民族文化古籍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因它太容易让人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而且容易使人想到共产党的“破四旧、立四新”实在要比秦始皇的焚书厉害了一万倍，说起来太难听，所以，后来的和今天的共产党，自然也要回避，并且生怕别人提及。但对那个“杀”字，共产党，包括当年的走资派在内，他们就不仅仅是要回避的问题，而是要“蓄意隐瞒”的，就是想将这一个“杀”字彻底地在历史上把它抹掉。原因，一是当时还杀不到他们及其亲人子女的头，他们不能感同身受；二是这一个“杀”字，实在是罪恶滔天，当年的共产党是“暗中默许却绝不报导”，今天的共产党则要“避而不谈和绝不承认”。因为不仅说起来太难听，甚至会激怒今天的老百姓，刺激他们想真造反。这与曾经天天要我们“忆苦思甜”的共产党，今日则天天要我们“向前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们才会只谴责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打、砸、抢、抄”，却绝不说他们是“斗、打、抄、砸、烧、杀”。那么，我为什么说中共的十六条才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敢于“斗打抄砸烧杀”的动力呢？

第一，这时因为，自从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1日和2日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两篇社论之后，在全中国，就已经到处弥漫着血腥的气味了。诚如毛泽东在号召横扫之前就已经预言的那样：“这一次又要有很多人自杀了！”

但需要说明的是，“横扫”之后的血腥，是中共历来发动“批判斗争”所产生的又一个“血腥社会效应”，还不是文革“诱导打和杀”或“默许打和杀”的结果。在形式上，工作组还在要求文斗，明确地反对武斗，主要是号召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逼迫检查和交代，尚属“文斗”范围。在内容上则主要是以批判斗争“反动学术权威”为崭新政治对象，即主要是教育、文化和科技界的专家教授及知识分子，或是身兼当权派的专家教授和知识分子，或是上述各单位中能力较强和有一定成就的知识分子，当然还要加上“老运动员即地、富、反、坏、右份子”。由于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批斗“走资派”，运动“横扫”的对象，基本上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应该说一说的是，中共文革发动40年后，仍有前造反派朋友认为，28年前（——1979）已经被共产党摘帽、改正和平反，按当时共产党自己计算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就是3500万人及其家属和亲人，至少涉及一亿人以上，仍然不能够属于“人民的范畴”。我对此岂但百思难得其解，而且听了心里十分难过，因为，我也曾是黑五类子女——难道，我们这些人，直到今天，还是连一个“民”也算不上吗？

正是在上述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因再也经不起批判斗争了，只好一死以“谢毛”，正好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有些人则因为向来走红，甚至向来享受共产党所给的荣誉和高位，因一时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而自己“轻生”；有些因早已“过五关、斩六将”，太了解共产党，认为自己虽然捱到了今天，但这一关眼看是过不去了，只好干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所以，它才是“横扫”的血腥效应，而不是中共文革公开诱导和暗中默许可以公然打人和杀人的直接血腥结果。

在这个阶段里，也曾局部地发生过打人的情形，即“武化批斗”的情形，比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北京大学的6·18事件，就有48位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教授及学校领导被打。但是，当时的工作组是反对的，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甚至还下了文件制止的，在全国，类

似的情形也还十分少见。当然，这是北京大学的耻辱，是北大“历史上卑鄙”的一个破天荒纪录。

第二，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由它所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立即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将人民日报自“横扫社论”发表以来，全国基本上还属于文斗的现状，迅速地 and 疯狂地发展到了“武化”的批判和斗争，直到红卫兵和造反派敢于公开地设立私刑，公然地打人和杀人。

因为，中共十六条，一是公开地号召要“敢字当头”。它的第三条就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它认为，“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领导干部，才是“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相反，它批评“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是‘怕’字当头”，因为，他们“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就是不敢破坏‘党内的现存秩序’——讲演者注）……”它继续指出：“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它甚至明白地指称：“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

所以，“十六条”总结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它号召说：“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敢’字当头……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儿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二是在第四条中，明确地重复毛泽东的“革命教导”：“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当让”。这等于是告诉共产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要造反革命，就不要雅致、不要文质彬彬、不要温良恭当让……。这就为毛泽东紧接着的另一番伟大教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作了鲜明的引导，等于是从正面鼓励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要使用暴力来造反。

但是，同样是在第四条中，中共十六条又明白地说道：“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句话，是把“要文斗不要武斗”，明白地放在“在辩论时”这样一个环境之下。而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又岂是“辩论”两个字所能够揽括得了的。因为，不说“大辩论”仅仅是文革武器——“四大”中的“一大”，而且是在绝对专政的严酷政治条件下，实际上真正的辩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单说“批判和斗争”，这两个真正锐利的文革主要武器，中共十六条对它们岂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甚至都没有“含糊”地规定它们：“要文批，不要武批；要文斗，不要武斗。”。问题是，恰恰是在八月伊始的文革批判斗争中，才出现了“武批武斗甚至是武杀”的普遍血腥景象，并且没有人制止过，也没有人敢于去制止。

有一点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要知道，当年的中国人，在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共产党文件时，都是“字字必较”的，因为他们不敢不把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看成是“字字珠玑”，因而才要把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消化和领会的。就不说，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死了之后，左派和右派都要利用我的话……”，也就是说，在生前，毛泽东早就将左的话和右的话都说过了，为左派和右派全准备好了。事实上，毛泽东确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什么话都说了”。但只有他心里明白，那些是他的真话，那些是他的假话；那些是暂时说一说，用来“挡一挡”的；那些则是他要别人去意会甚至执行的……。现在就有前造反派人士，拿出毛的话来证明毛发动文革，是出于要打倒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说实在的，这就

象现在海外有糊涂华侨歌颂共产党正在反对贪污腐败、成就很大、前途光明一样，是只看外表，不咎其实；只听其言，不察其行。只不过说这种话，在华侨虽是“善良的糊涂”，在某些前造反派，则是“善良的私心”罢了。

还有，就是在中共十六条的第四条中，还明确地说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然而，什么才叫做“斗倒，斗垮，斗臭”？难道还有什么能够比把人打得“趴”下来，更叫做“倒”吗？难道还有什么能够比把人“活活打死”，更叫做“垮”吗？难道还有什么比把人打得浑身冒血淌脓，直到被打死，连尸体发臭了，也不准家属子女收尸安葬，甚至还要其家人和革命群众一起，围着正在腐烂的尸体，甚至是刚刚从棺材里挖出来的尸骨，高呼口号，进行批判斗争，更叫做“臭”吗？如我前面所说，文革时红卫兵和造反派对共产党自己的领袖瞿秋白和晚清张之洞、康有为的尸骨，就是这么干的。虽然，十六条在号召“斗倒、斗垮、斗臭”之后，又说还要让他们“重新做人”。然而，人都被斗倒了，斗垮了，斗臭了，有的已经有了终生的残疾，有的成了永远的痴呆，有的早已成为永远的冤魂和苦鬼，他们又如何能够“重新做人”？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残酷与虚伪，中共文革的毫无人性却又假仁假义，单看他们的“十六条”，就能够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一句话，就是倘若没有中共十六条的公开号召和诱导，就不会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斗、打、抄、砸、烧、杀”之种种极端残酷行为的大规模出现和无止境发展。

### 三、毛泽东诱导、支持、教唆和默许红卫兵造反派“斗打抄砸烧杀”

当然，中共十六条，作为中共的文献，和中共要公开颁布的文件，除掉公开号召“斗”以外，它不可能公然地号召“打砸抢抄杀”，甚至还要装模作样地告诫“在辩论时，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谁都知道，共产党和毛泽东向来都采用的是“革命的两手”，就是一边“好话讲尽”，一边“坏事做绝”；就是真正地“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就象共产党现在一再地公开宣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继承者”，却又不断地阴谋策划放言、放人到海外、甚至是到台湾去和台独人士一起诬蔑攻击孙中山先生，唯恐孙文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被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所效法。而毛泽东和共产党自从在江西井冈山拉竿子起，就把“打砸抢抄杀”当成了家常便饭，而且十分成功，是拥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的。正因为这都是中共的“德性”，还有，所以，在中共颁布十六条的前后和背后，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个已经“登堂入室”的阴谋小组织，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早就在唆使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打砸抄烧杀”了，而且在蓄意培养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是敢于“斗打砸抄烧杀的脾气”了。这可是搞乱天下以夺权的最好办法。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1966年7月21日，刚刚从武汉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就在他“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中，明确地感慨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因为红卫兵们和造反派们被工作组压着，还没有“冲向社会”，实行“打砸抄杀”，所以，毛泽东才觉得北京“太冷清”。他担心象这样下去，运动将不能如他所愿望地那样发动起来。

1966年7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谈话时，已经严厉地说道：“……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为了实现让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能够冲向社会，大搞“打砸抄烧杀”，毛决心要撤掉“要求文斗、反对武斗”的工作组。

1966年7月28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毛已经迫不及待地暗中派他的老婆亲自去“挑动和教唆”青年学生“武批、武斗和武



打”。他知道，他如果还不派人去挑动和教唆，那么，运动永远只会“冷冷清清”，他要搞的“刘家党大乱”的目的便永远也达不到。这是他自身的革命造反经验早就告诉过他的。

未料，就在这时，他收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给他写的信，诚如周恩来后来所形容的那样，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这个在“七月份还势力很小”的造反力量，被他“及时地抓住了”。

1966年8月1日，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在信中所表达出来的激动和感激，几乎令人有拍马屁之感。在这封信里，毛还特别提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而这个彭小蒙，就是7月26日在北京大学当着江青和一万多人面，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那个女中学生。而且就是她，才开了在大会主席台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当然，毛泽东之所以热情地表扬、鼓励了这个彭小蒙，是因为他已经从他老婆那里知道了这位女红卫兵的“革命行为”。后来，毛泽东还把在这个大会主席台上开了打人先例的彭小蒙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与自己一起检阅他的红卫兵们。

1966年8月5日，经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发出新的文件，正式撤销了6月20日中共批准下发的文件。因为，这份由刘少奇批准的文件，曾支持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6月18日在校园里面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批斗行动。因为，毛泽东已经明确地指出，北大6月18日的暴力批斗事件“是革命的”。毛泽东不仅是默许了武批武斗和武打，而且等于是公开地表态支持“武批武斗和武打”。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当面对她的名字发表评论说：“要武嘛！”接见之后，共产党“东北王”宋任穷的这个名为“文质彬彬”的女儿宋彬彬，就改名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就是中共的皇家女子主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毛泽东终于公开号召“要武”了。为了搞乱天下，以便乱中夺权，他决心不顾一切。在他的眼里，“地富反坏右”的命当然不值一提，“普通人”的命自然也不算什么，就算是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专家的命，哪怕是那些曾经跟他打过江山的共产党老干部的性命，甚至包括那些正在跟着他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性命，在他又能算几何？！

所以，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一切滔天罪行，不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亲自号召、教唆和诱导的，而且是毛泽东了解和默许的。

王友琴在她的研究中指出：“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在‘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528页）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但却毫无下文——讲演者注）。1966年8月20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的母亲闻讯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同上）

“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就是红卫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当然，这个数字是早已经过了大大地“缩水”的。然而，会上，居然没有任何人表示过谴责，哪怕是不满和担心。

迄今为止，中共都没有任何文件显示，毛泽东曾发表过任何一句“最高指示”，以制止过杀

人的红卫兵运动。甚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其它领袖，不论他们内心里是否反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暴行，但他们都从来没有公开地站出来制止过，反对过。就不说许多中共领袖人物手臂上戴着的那一只只血红血红的红卫兵袖章了。

相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却把——1966年8月开始的红卫兵杀人运动，当成了他和共产党要发动的那一场“伟大革命”的一个部分，当成了红卫兵的伟大创举和革命功劳。在毛泽东，是因为，正是这场红卫兵的残酷杀人运动，才为他一心相与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开了血腥的局面；在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则是当屠刀还没有架到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亲人的脖子上时，杀死再多的群众，就是普通人，至少也是属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部份，是他们自己早就干过和不止干过一次的革命造反壮举；在极少数前红卫兵和造反派人士那里，被杀死的普通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值得一提，更何况那些根本就算不得是“人和民”的、早就被共产党的“公安六条”规定为“不准参加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黑五类罪奴们”呢？

所以，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才是红卫兵造反派“斗打砸抄烧杀”运动的真正教唆犯。

我认为必须说清楚的是，敢于公开毒杀无辜百姓的红卫兵杀人运动，其主力，就是中共的干部子弟，特别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之地。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中共的“土贵族子弟”。

王友琴的研究指出：“最早和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那些有较多高级干部子女的学校中，那里的红卫兵也比别的学校更为活跃。对家庭出身的绝对强调给了某些年轻人巨大的特权。这特权甚至包括打死同学和别的人的权力。这种特权刺激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如果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平等地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个组织可能不会如此狂热与暴力化。”（同上）

她的研究还指出：“红卫兵把学生家庭背景的所谓‘阶级成份’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这是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红卫兵把家庭出身当作成为其成员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并且绝对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活动小组，起名‘梅花’，因其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被指控为‘阶级阵线不清’，被红卫兵强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平等的同学关系被破坏了，一些年轻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轻人。”（同上）

我还想说，共产党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曾年年月月日日地强调阶级斗争，要年轻一代牢记所谓“旧社会和反动派”们对他们制造的血海深仇。然而，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谁制造的血海深仇能够比共产党对中国人命制造的血海深仇，更深、更广、更无可比拟？而且无处可诉。甚至直到今天，这史无前例的血海深仇，竟仍然被压迫着非但不能剪雪，甚至不给声张，哪怕是想讨一个说法，或叫共产党只需说一声“对不起”，都“没门”！难道就因为他们都曾是“黑五类”或各种曾被共产党专政的“份子及其家属、不属于人民之‘民’”吗？天理何在？

要知道，弥天大谎常常是要和弥天大罪连接在一起的。

就这样，一场实实在在的“武化大革命”，就这样充满着“情趣”地开始了。只是此时和此后的血腥，将再也不是共产党号召发动批判和斗争的“客观社会效应”，而是共产党、毛泽东暗中教唆和公然号召起来的“斗砸抄打烧杀”，所公开制造出来的“直接血腥结果”。

#### 四、红卫兵造反派“斗打抄砸烧杀”的直接血腥结果

由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暗中教唆默许、甚至公然诱导号召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斗砸抄打烧杀”，

其直接血腥结果之惨烈，便又成了一个“史无前例”。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才在北京和各地迅速成立和发展起来。

1966年8月5日，由于中共中央肯定北大6月18日“武打批斗”该校教授和领导“是革命的”，就等于在事实上直接支持了北大暴力批斗的行为，所以，在北京大学，工作组一撤走，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那个“红旗战斗小组”就在校园里大规模“开打”老师了。

8月5日当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就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她的先生第二天就上街买了一部相机，将其妻卞仲耘被学生毒打致死的惨况全部记录下来，珍贵的文革纪录片“我虽死去”就是根据他的摄影纪录，在四十年后制作的（黄花岗杂志网站上挂有文革纪录片“我虽死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对给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了“要武”的“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的暴力行动随即在各地升级发展。

1966年8月31日，林彪和周恩来等都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无疑大大加强了红卫兵的“权威性”。

于是，他们在校内斗杀老师甚至同学，在校外抄家打人，烧书砸毁文物，直到公开大杀无辜百姓，却自称是“杀向社会”（中共的“十六条”就是号召他们“冲向社会”的）。

最早打死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即宋要武，便立即跑到北京经济学院，鼓动那里的红卫兵打人打老师。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说的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彭小蒙，也跑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煽动……8月下旬，北师大女附中的几个初中二年级的红卫兵，竟把附近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个十八岁的女服务员抓来，说她是“流氓”，把她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们，则在校园里的一个塑有白色仙鹤雕刻的喷水池里，不仅砸了仙鹤，而且杀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请参阅王友琴“1966：打老师的革命”，黄花岗杂志第21期）。

1966年的8月至9月，在中共十六条公布了“不准学生斗学生”之后，在北京，仍然有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同校甚至是同班的红卫兵批判、斗争、侮辱，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有的则因不堪侮辱而自杀。1966年8月4日，北师大女附中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就用一根长绳子将同班10名“黑五类出身”同学的脖子，一个接着一个的捆成一串，在教室里进行“斗争”。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以侮辱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这个狗崽子队遭遇了本校红卫兵的太多侮辱，甚至是下流的侮辱。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遭到“斗争”和侮辱，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清华附中的高一学生杨爱伦，因在学校被斗争和关押，而卧轨自杀，幸被撞成重伤。该校高二学生、“右派分子”的女儿郭兰蕙，也因遭遇红卫兵批斗而服毒自杀，死时才19岁。北京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的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女学生，只因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就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从下午一直打到傍晚，然后悲惨死去。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的一名初中学生，也因被指控在开会时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底下，就被本校红卫兵在教室里将她毒打至死。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红卫兵关押在学校里，连一只耳朵也被同校的红卫兵割掉了。北京第十三中学的红卫兵不仅用一条铁链拴在“家庭出身不好”的

同学任春林的脖子上，还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去领受毒打。该校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竟然被同校的红卫兵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直到把他活活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学，出身于“小业主”家庭的高三学生王光华，因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回校后即就被关进学校的监狱之中被毒打致死……（同上）

正是在1966年的8月和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黑五类”的家，据不完全统计，打死“黑五类”有4千余人，将10万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赶下乡去。他们大多是被分批地集中在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被剃着阴阳头，当众忍受着红卫兵们不时的拳打脚踢、皮带抽打或更严重的刑罚。

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仅仅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就有325个“黑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被北京市来的红卫兵和本地的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连三岁的“狗崽子”都不能幸免。

正是在疯狂的“斗打砸抄烧杀”当中，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不仅公然掌管了学校，而且真正地“杀管”起社会来了，他们手操生杀大权，驾于法律之上，建立了“纠察队”，确立和完备了红卫兵的权力机制。比如“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就发出过十三个“通令”，规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驱逐哪类人离开北京城去农村等等。他们的“通令”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到处张贴，不仅像政府法令一样有权威性，而且还要由他们通过暴力行动来强制执行。前面所讲，1966年的夏秋之交，北京曾驱逐十万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纠”的第四号和第七号“通令”命令实行的……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和驱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动的全过程，包括抄家，注销户口，没收财物，押送上火车，以及处理死尸，主要是由红卫兵执行的。“西纠”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张贴或散发，指导那儿的红卫兵的行动，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动。在校园里殴打老师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最初练习和实践。（同上）

同时，正是伴随着毛泽东号召“革命大串连”，和毛泽东前后八次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才把在北京残酷发动起来的“红卫兵斗打砸抄杀运动”，推向了全中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革命串连’到贵阳，打了那里的剧团演员，还剃了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园长的头发，并用铜头皮带把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打得满背血渍。”（同上）至于北京的红卫兵串连到了各地，特别是那些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特别使命的北京红卫兵们串连到全国各地之后，所立即掀起来的“斗打砸抄烧杀”行动，就更不知道使多少中国人冤死在他们的“水火棍”和种种公开施行的残酷私刑之下。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夏天和秋天，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和多少人家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红卫兵“斗、打、抄、砸、烧、杀”，直至被无辜“毁家害命”，那就只有等到共产党亡党亡国之时，我们的人民已经能够起来控诉和解密共产党的杀人档案了，才能够搞得清楚……

## 五、“破四旧、立四新”是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抄斗烧杀”的血腥大舞台

我现在想简单地说一说的是，中共“十六条”所号召的，特别是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上所大声疾呼的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这一洋教、邪教理论，在中国的又一次疯狂发作，而且如我前面所讲，它还与毛泽东一心要发动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命运息息相关。

而我现在特别要说明的，一是由毛泽东亲自支持、发动起来的那一场红卫兵“斗、打、砸、

抄、烧、杀”运动，不仅疯狂发展在中共号召“破四旧、立四新”之前和之中，甚至是它的高峰期，而且正是这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道德毁灭运动，才不仅给了红卫兵们以敢于杀人的精神胆量，而且为他们彻底地撤除了道德禁锢的所有藩篱，从而才能够使得共产党的红卫兵造反派敢于“为所欲为和无所不为”。

二则正是这一场中共号召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才又给残酷的红卫兵运动，提供了一个若大的“斗、打、砸、抄、烧、杀”的舞台。正是在这个舞台上，毛泽东的红卫兵们，不仅得到了副统帅林彪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地的公开叫喊支持，而且得到了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首的中共所有舆论工具的正面歌颂和热烈支持（虽然对红卫兵打死了多少人绝不报导）。正是因为毛泽东、林彪和共产党将“破四旧和立四新”的“伟大革命任务”，交给了他们的红卫兵小将们，并号召、支持、诱导和默许他们用“斗、打、砸、抄、烧、杀”的残暴行径来完成这一项光荣使命，这就不仅为红卫兵们毫无顾忌地“斗、打、砸、抄、烧、杀”，特别是“烧和杀”，提供了足够的“革命胆量”，甚至是无边的“杀人激情”；而且，为红卫兵们胜利地完成“破四旧和立四新”的使命和冲开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局面，起到了无以替代的“历史性作用”。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所亲自发动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能够“进行到底”；所以，也就是“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所要求于他们的……。而毛泽东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就更能说明，他们所犯下的一切滔天罪行，都是由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所带领着他们干的。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因为，毛穿着军装和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光辉形象”，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中国共产革命那个无比血腥而又肮脏的历史画面之上。

（续完）

□《黄花岗》第二十一期 2007年6月27日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